



中日关系

——复交30周年的思考

金熙德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中日关系

——复交 30 周年的思考

金熙德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江

陈来胜

封面设计:林 昶

责任出版:夏凤仙

责任校对:何 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日关系:复交 30 周年的思考/金熙德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12

ISBN 7-5012-1942-7

I. 中… II. 金… III. 中日关系—研究

IV. D822.3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1358 号

中日关系

Zhongri Guanxi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邮政编码:100010)

网址:<http://www.wapbook.com>

北京市朝阳展望印刷厂照排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 字数:230 千

2002 年 12 月第一版 2002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5012-1942-7/D·370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金熙德 1954年生于延吉市。1982年延边大学政治系毕业。1985年延边大学日本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任讲师。1986年7月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康涅狄格州立大学政治系从事研究。1989年3月起在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攻读国际政治学。1994年3月获学术博士学位。同年夏季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现任研究员、中日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对外关系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亚太学会副秘书长、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等社会职务，被国务院授予政府特殊津贴及证书。

主要学术成果：《日本近代哲学史纲》（1988）、《日美基轴与经济外交——日本外交的转型》（1998）、《日本政府开发援助》（2000）、《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20世纪90年代新动向》（2001）、《彻底验证！日本型ODA——非军事外交的尝试》（日文，2002）、《再生还是衰落——21世纪日本的抉择》（主编，2000）、《中国的东北亚研究》（主编，2001）。另外，参与20余部著作的写作，并在国内外发表有关日本外交、中日关系以及东北亚问题论文百余篇。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追本溯源:逻辑与历史的起点	(10)
第一节 理论: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体	(11)
第二节 现实:中日两国的基本特征	(19)
第三节 条件: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	(43)
第四节 历史:中日现代化进程比较	(63)
第二章 新的起点:“72 年体制”的内涵	(87)
第一节 启示:复交不易,理应珍惜	(87)
第二节 契机:台湾问题的定位原则	(96)
第三节 基础:历史问题的处理方式	(113)
第四节 成果:相互安全的基本共识	(118)
第五节 条件:钓鱼岛问题的搁置模式	(124)
第三章 而立之年:复交 30 年的回顾	(129)
第一节 经济:贸易、投资与 ODA	(129)
第二节 政治:前 20 年的长足进展	(156)
第三节 政治:后 10 年的曲折前进	(160)
第四章 世纪之交:双边框架的调整	(171)
第一节 转折:中日关系的演变轨迹	(171)
第二节 目标:“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175)

◆ 中日关系

第三节 波动:最近几年的大起大落	(186)
第五章 2002 年:复交 30 周年的思考	(212)
第一节 反思:30 年的经验与教训	(212)
第二节 正视:21 世纪初的新特征	(221)
第三节 症结:经济互补与安全相斥	(238)
第六章 21 世纪:中日关系的展望	(247)
第一节 近景:两强趋势下的严峻课题	(247)
第二节 中景:东亚合作与中日关系	(253)
第三节 远景:区域一体化与中日关系	(271)
后 记	(282)

引 言

2002 年,中日关系迎来了复交 30 周年。

如何评价 30 年来的中日关系?“而立之年”的中日关系究竟有哪些基本特征?未来中日关系将如何发展?在这一颇具特殊意义的年份里,每一个日本问题研究者都面对着对这些疑问给予思索和解答的课题。本书就是笔者针对这些问题交出的一份答卷。

1. 中日关系的特点和趋势

在当代国际关系之中,中日关系堪称一对既十分密切又异常复杂的双边关系。

一方面,两国在地理上一衣带水,隔海相望,其相互交往关系可以上溯至 2000 多年以前;两国同属儒家传统和汉字文化圈,当今又互为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之一,相互间文化与民间交流不断扩大,两国的相互依赖正日趋加深。

但另一方面,近代以来两国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命运,日本对中国的野蛮侵略给两国关系刻下了至今仍难抚平的历史伤痕,当今彼此间又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和安全疑虑,以致使中日关系呈现出了一种“近而远”的矛盾特征。

回首中日复交以来 30 年岁月,特别是最近 10 年间,中日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均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方面,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日两国间政治关系的动向以及双方的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的反应均显示,两国间的互信程度和民众感情一再滑坡,历史问题上的感情恶化和安全关系上的相互戒备呈现不断加重之势。

另一方面,近年来中日经济交往却展现出了历史上最好的“双

赢”局面,两国在经济领域已是相互密切依赖,谁也离不开谁。2001年,中日贸易总额已达877.5亿美元,有望在近期内跨越1000亿美元门槛。日本自1993年以来连续9年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也已连续数年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如何诠释中日之间“政冷经热”这种颇为令人困惑的巨大反差呢?

究其根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进入了重新调整、重新定位的转折期。促成这一转折的原因,既有国际环境因素,也有中日双边关系因素。其中,中日双方均出现新的大国化趋势并呈现竞争意识上升之势,是导致两国关系迎来新的转折局面的一个关键因素。值此世纪之交,忽略或回避中日两国的大国化趋势问题,已将很难客观、全面地把握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

从民族心理的观点看,中日两国过去均有过在本地区发挥大国影响的时期,因而当今两国的大国化趋势并不完全属于新兴大国崛起的范畴,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寻求恢复过去曾享有的大国地位的意味。中日两国同处一个地缘政治区域,双方的大国地位在历史上是交替出现的,如今双方都认为对方重建以往那种类型的大国地位是很难接受的。所以,当这两个东亚大国有史以来首次同时呈现大国化趋势时,其相互关系并不存在现成的双边模式可循,这种情况大大增添了两国关系的复杂性、竞争性和排斥性。

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中国始终处于东亚中心大国的地位,日本则为该地区的一个边缘国家。然而,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日本成功地崛起为一个大国,而中国则从大国地位跌落下来。

20世纪40年代二战结束时,中日两国站到了不同的历史新起点上,走上了各自相异的大国化道路。概言之,中国走的是首先确立政治大国地位、然后经过一段探索期之后终于启动经济大国

化进程的道路。与此相反,日本则是首先确立了经济大国地位,然后才步入政治大国化的轨道。

中日两国的国力比较,历来是一个认识比较混乱的领域。这是因为,国力不仅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国土、资源、人口等较易进行定量比较的“硬实力”因素,而且包括诸如文化魅力、国民士气、外交素质等很难予以定量分析的“软实力”因素。^①更何况,一个国家的对外影响和国际威望与该国的路线与策略及其实现能力密切相关。加之,一个国家的对外影响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自我定位、意识结构等民族心理因素。以这些因素综合衡量,中日两国的实力基础显然具有不同特点,两国的强项各有千秋。概括地讲,日本的主要强项就在于其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较高的社会现代化程度。另一方面,日本国土狭小,资源高度依赖进口,安全脆弱性较大,如今又正经历着 10 年经济萧条和社会全面转型。与日本相比,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水平无疑尚存在较大差距。然而,中国在国土、人口、资源等“硬实力”和一些“软实力”领域却具有优于日本的国力条件,如今又正处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上升时期。

由于双方的国力强项与对外政策大相径庭,中日两国的国际地位与作用体现在不同领域,表现出了不少相异之处。二战结束以来,中国主要在国际政治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则在国际经

① 关于“国力”的构成要素,迄今为止形成了几种界定类型。(1)R 克莱因(Ray S. Cline)主张按要素性质区分,即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2)N 斯拜克曼(Nicholas J. Spykman)、H 摩根索、R 阿隆(Raymond Aron)等人主张按具体要素区分,如提出十要素说、九要素说、三要素说等。(3)J 奈(Joseph S. Nye)主张按实力的形态区分,提出了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概念(黄硕风:《综合国力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第 6—9 页)。近年来,国内学者中涌现出了一批国力研究成果。黄硕风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论著,另有宇剑等《国力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 年)、周浩然等《文化国力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年)等专著以及一批相关论文。

济领域占据了重要地位。中国贯彻了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在两极冷战格局中推动了多极化趋势,在南北关系中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日本在国际经济和援助领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在国际政治领域则还未能显示出大国风范,而是基本上依然采取着一味追随美国的姿态。

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证明,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往往引发维护现存国际秩序的各国的戒心和敏感反应。但同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崛起,并不具有运用武力挑战现存秩序的必然性。历史与现实充分证明,引导一个国家走上对外军事威胁的决定性因素,主要不在于经济发展水平,而在于该国的对外战略与政策。中日两国同处一个地缘政治与经济区域,如今又都处在“崛起”阶段,双方如何应对和化解针对两国的各式各样的“威胁论”,不能不是两国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大国化趋势和日本的政治大国化趋势日趋明显,大国化趋势日益成为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这种影响,突出地表现为两国相互间的战略猜疑和竞争意识的增强,具体表现在国家利益、历史因素、意识形态、民族竞争等多种领域。

第一,国家利益的碰撞。中日两国面对对方的大国化趋势,都面临着如何对待对方“崛起”的问题。中日双方能否避免或减少因“零和博弈”、“囚徒的困境”等行为模式和“一山不容二虎”的思维模式而带来的过度竞争或战略对立呢?这一趋势将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关键性的影响。

第二,历史阴影的影响。近年来日本一些右翼势力紧锣密鼓地“改写历史”的动向表明,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还远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很多中国人之所以对日本的“崛起”趋势存有戒心、不愿对其明确表示支持,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担心日本翻侵略历史的案,重走对外武力扩张的道路。

第三,意识形态的束缚。有的日本人动辄声称,由于中日两国的体制与意识形态不同,所以不可能真正实现睦邻友好。这是一种片面的、落后于时代的冷战型思维。意识形态的差异,确实是双边关系中的一个影响因素,但却不是而且也不应成为其决定性因素。

第四,民族心理的竞争。从古代至近代,日本一直处于以华夏文明为中心的东亚“华夷秩序”的边缘。近代以来,日本在学习西方文明方面走在中国前面。如今,中日两国又都处于新的“崛起”阶段。在历史与现实的多种因素影响下,中日两个民族相互抱有很强的竞争意识。目前,不少日本人对中国如何看待自己的大国化志向十分敏感,对中国的经济大国化趋势抱有戒心。很多中国人则对日本究竟要崛起为何种大国心存疑虑,对日本一些政治势力在台湾问题上“协美助台”、在东亚安全格局中“挟美制华”的企图十分反感。

上述种种现象,均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与现实根据,因而不会轻易地自生自灭。然而,中日之间也有一部分相互认识却是由相互理解不够或信息不足而造成的。一些日本人鼓吹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往往是以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些不确定因素为依据,但其结论却并没有反映出中国发展的客观趋势。有些中国人对日本的未来发展趋势心存疑虑,则是出于对近年来日本国内呈蔓延之势的否认侵略历史的倾向和走向军事大国的一些迹象抱有警惕与忧虑。日本将来究竟走“普通国家”的道路,还是采纳一种“民生大国(Civilian Power)”的社会发展模式?对此不仅中国人正拭目以待,而且日本人自身也一直在进行激烈的战略论争。

可以说,伴随大国化趋势而发生的中日间的战略竞争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对此必须具有清醒的认识。然而,不管两国的大国化趋势如何发展,双方“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

理。中日两国要想避免或减少“斗则两伤”的负面影响,就应共同探讨推动“双赢”趋势的途径。为此,仅有“和则两利”的原理和寻求“双赢”的良好愿望显然远远不够,还必须为中日关系设计出双方都能接受的相互关系长远模式。该模式应充分考虑到对方的利益取向、行为方式以及其他各种因素,在此基础上找出可以达成一致的领域;对那些暂时难以达成一致的领域,则应当共同商讨尽量减少相互损失的妥善方式。

中日两国从战略猜疑、相互调整走上真正成熟的相互合作,需要一个相互适应过程。其中的焦点问题是:中日两国能否和如何接受对方的大国化趋势?

近年来,不少日本人抱怨中国不支持日本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面在许多中国人看来,近年来日本正与美国一道构筑防范中国的军事同盟体系。可见,现阶段中日两个民族对对方的大国化趋势还缺乏全面认识和相互信任,还未能找出相互从容应对的双边关系模式。就目前趋势面言,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还不能完全排除由战略猜疑走向战略对抗的潜在危险。

有鉴于此,中日两个重要邻邦不宜继续回避战略对话,而应积极而慎重地就未来相互战略关系进行冷静、理智的对话,致力于促成两国间成熟的战略谅解,在 21 世纪走向战略合作关系。

同一地区内两个“崛起”中的大国就未来相互战略格局进行高水平、高层次的对话,其难度之大、进展之不易是可想而知的。但正因为如此,两国的有识之士应当认清战略对话的重要性,积极推动这一进程。应当从基础做起,官民并举,点滴积累,开展多渠道、多形式的对话与交流,以求增进相互认识、相互理解与相互信任,这不能不是除了走向对抗以外的惟一选择。

2. 中日关系的研究方法

对中日关系这一研究对象,人们可以从多种不同的目的、视角和方法进行研究。迄今为止,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分化与综合

的发展历程中逐步演化出了两对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交叉的主要研究方法类型。第一对类型是历史学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第二对类型是基础研究和对策研究;这四种方法都各有其独自的发展史、一整套知识与理论体系以及不可替代的专长与功能。

中日关系的研究方法类型

第一对类型	历史学研究	国际关系研究
第二对类型	基础研究	对策研究

我们日常看到的关于中日关系的每一篇论文、每一部专著中所贯穿和运用的研究手法,其实大都是由这四种研究方法按一定比例组合而成。根据这几种研究方法的混合成分的差异和侧重点的不同,每一个学术成果的学术风格、内容重点、研究成分以及现实意义也就会各有千秋。至于研究成分很少的著述,有的属于非研究类的通俗评论,有的属于解释政策的宣传材料,有的则属于研究类成果中的质量不高的作品。

从科研现实的角度看,一方面,中日关系这一研究对象的整体性要求人们尽可能全面、综合地运用各种研究方法;另一方面,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学科的专业化趋势和个人能力的有限性,不能不限制每一个研究者的视野。

“在我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研究只是在近一二十年才刚刚出现”^①。而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有关双边关系研究的理论又是一个相对落后的领域。“在国际政治学中,关于如何分析双边关系,几乎不存在确定的分析框架。”^②基于这一条件,中外学界都普遍存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国别研究及双

① 王逸舟:《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载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② [日]田中明彦:《日中关系:1945—1900》,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第209页。

边关系研究各自发展、彼此间严重脱节的现象。

在这种特定的双重背景下,迄今为止我国的中日关系研究,总体上以史学研究为多,以对策研究见长。而运用国际关系理论观察和分析中日关系,则可以说是一种近十几年来方兴未艾的新兴学科发展趋势。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在中日关系研究中的生根、发芽、结果,无疑将大大增强人们分析和认识中日关系的能力,并与史学研究方法形成互促互补的良性循环,其结果也将能进一步提高对策研究的水平。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中日关系是当代国际体系中的一对双边关系,其发展进程是一个受制于国际、国内和双边这三个层次上一系列影响因素的客观进程。从我国对日政策的角度看,我们能够而且只能通过合理的对策及其有效的实施来尽可能地改变这些影响因素,但却不可能主观地超越这些客观存在的现实条件。如果承认对外政策的基点就在于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那么评价一项对日政策,主要应看其是否有利于维护和增进我国在对日关系中的最大利益,而不应以其他各类主观价值判断作为基准。

回首中日复交以来的30年,特别是最近10年的历程,不仅中日关系现实本身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中日两国相互观察对方的认识框架也发生了同步变化。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中日两国都发生了世代交替,具有与老一辈不同经历和知识结构的新一代已成为两国社会各界的主流。

笔者曾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指出,由于国际环境和双边因素的变化,中日关系已进入了重新调整、重新定位的新阶段。记得当即就有一些同志表示政治上的反对和感情上的拒绝。这一事例充分证明,只有良好的愿望而无对国际关系的跟踪研究,是不可能及时、客观地把握和理解中日关系的客观变化趋势的。

21世纪初,中日关系正处在共同构建“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转折期。未来10—20年期间,是影响中日关系的一些最重要因素

的变化方向进一步明朗化的关键时期。“中日伙伴关系”的目标能否得以实现？应当说，从目前看，其前景既有光明，也有阴影。惟其如此，我们的中日关系研究更应在基础研究和对策研究两方面再上一层楼。就我国的对日政策而言，应在中日关系中力求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尽量争取实现有利于我国的周边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最佳前景。

基于以上概观，本书拟从追溯中日关系的逻辑起点和历史前提入手，回顾和总结复交以来 30 年间中日关系的经验与教训，在此基础上对其当前现实特征和未来演变趋势做一番深入、系统的探讨。

值此中日复交 30 周年之际，笔者作为日本问题和中日关系的研究者，旨在把自己最近一段时期对中日关系的思索结晶归纳于本书当中，以作为对这一特殊年份的一份献礼。

第一章 追本溯源:逻辑与历史的起点

中日两国是隔海相望的邻邦,相互交往历史长达 2000 年之久。因此,当代中日关系的逻辑起点和历史前提,均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与外延。

对中日关系这一对象进行研究,其首要前提就是要尊重和正视其在漫长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一系列“个性”,本着科学、客观的态度具体分析每一个具体史实。

但与此同时,中日关系既然属于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对双边关系,它就必然遵循着国际关系中的一系列普遍规律,带有与其他双边关系共同的一些“共性”。把握这些普遍规律,则有助于提高中日关系研究的科学性,避免陷于单纯罗列一系列史料的盲目性。

个性与共性、历史视角与国际视角、中日间长期形成的相互看法和当代社会科学方法,这些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如能尽可能达到协调与统一,则将有助于勾勒出一幅更为完整、更加客观的中日关系全景图。

在第一章里,笔者拟首先探讨当代国际关系的一般原理及其在中日关系中的表现方式,从而致力于抽象出当代中日关系的逻辑起点。以此为铺垫,在本章后一部分,笔者将以中日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为线索,致力于展现出当代中日关系的历史前提。逻辑起点和历史前提的统一,将有助于我们得到一个观察和分析当代中日关系的坐标和总体框架。

第一节 理论: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体

中日两国都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国家行为体(actor)。因此,在对中日两国的基本特性加以比较之前,有必要就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基本内涵界定一个相对确定的范围。

顾名思义,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主权国家则是这一关系的最基本单位和最主要的行为体。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双边关系(bilateral relations),指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是构成国际关系的逻辑起点和现实基础。英国学者J. 福兰克尔基于奥本海《国际法》(L. Oppenheim, *International Law*)的定义指出:国家的构成因素是极其丰富多样的,其中,与对外关系直接相关的主要因素包括人民、领土、政府、主权等四项。^①笔者认为,从国际关系意义上看,国家的首要特征就在于具有统一的领土并在其领土范围内具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即绝对权威。

国际关系中的其他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包括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国际机构、同盟、一体化组织以及个人等等——或是从属于某一个主权国家,或是由主权国家发展和派生而来的。

可以说,自从人类社会诞生国家之日起,国与国之间便有了国际关系;然而,主权国家及其相互关系,则是国际关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即近代时期的产物,它是西欧国际体系扩展而成为世界体系的结果。^② 主权国家是近现代国际关系的产物及其基本单

① 参见〔英〕Joseph Franke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cond Edition, Oxford Paperback University Series, 1969, Chapter I

② 国际法上的主权国家,是以近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形成为基础的。近年来国内关于民族国家的研究也有了一定进展。参见郭少棠:《民族国家与国际秩序》,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张跃法等:《民族国家与世界经济:1500—1900》,时事出版社,1999年。